

CSSCI来源集刊
总第**21**辑
2012年春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国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SSCI 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2012 年春季号 总第 21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研究. 2012 年. 春季号: 总第 21 辑 / 张宪文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97 - 3300 - 4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近代史—
研究—民国 IV. ①K25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6149 号

民国研究

(2012 年春季号 总第 21 辑)

主 编 / 张宪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李建军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责任校对 / 李 惠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300 - 4

定 价 / 39.00 元

印 张 / 16

字 数 / 28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生活就是秘密——这是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取自2010年秋天比尔·波特先生在成都青峰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生活就是秘密》是我最新的一本散文随笔集，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些关于读书的随感；第二个部分是一些有关日常生活中人与事的散记，第三个部分是我从几年来的博客文字中选取的一些片段。

在整理、归纳、编排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分类是很困难的。

在以前的写作中，书房、客厅、厨房和家之外的酒吧、茶馆、旅途……似乎有所区分；现在，它们全部融为一体。在这本书里，虽然对题材有了一个划分，但这种划分其实更多是体例上的要求，而非内容上的区别。在我，写作、读书、观影、写博、思考，这些所谓的精神区域里的劳作和享乐，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和每天的生活细节完全融为一体，和每天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神经反应和情绪体验完全融为一体。写作之于我，并不高于我把整个家收拾整理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读书之于我，跟我在小区院子里遇到我喜欢的猫或狗一样的欢喜；而我在看完一部很好的

目 录

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

历史的选择

- 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时代意义 林家有 / 1

共和在乡村

- 以民初南昌、吉安、南丰为例 吴永明 孙西勇 / 13

城市史研究

孙中山的“南京新建设计划”及其在民国时期的

- 实践成绩 陆 艺 经盛鸿 / 24

- 国民政府“繁荣北平”活动初探(1928~1931) 王 煦 / 40

人物研究

- 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 马陵合 / 55

- 胡适与人权论战的起落 冯 峰 / 72

- 护法运动时期的戴季陶与日本 张玉萍 / 90

Three Revolu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Ho Kai,

Sun Yatsen and Fu Bingchang Yee Wah Foo / 107

专 论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识近代中国官僚资本 刘方健 陈 拓 / 137

南京伪政权的政治文化:以成立与纪念庆典为中心 王 楠 / 151

山西大学校新共和学会述论 杨彩丹 郎永杰 / 170

研究综述

2006年以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汪效駟 / 180

试论二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以列文森奖获奖作品为例 张 欣 / 198

近30年来的民国合作运动史研究综述 许永峰 / 212

史料视窗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文献选译之二

——关于美国专利在华保护问题的交涉 以 清 编译 / 228

稿约 247

历史的选择

——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时代意义

林家有*

孙中山作为辛亥（1911）革命的领袖，近代中国百年巨变杰出代表，他的贡献是巨大的、深远的，它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中国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独立、共和、民主和富强的新时代。为什么孙中山能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和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作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在人民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

中国人民选择了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是人民对他的领导才能、品质和风范的肯定。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引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时代需要伟人，革命需要领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既有时代和历史的因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勾结镇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

*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50页。

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义和团运动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分化，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取瓜分中国的办法把它变为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因此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利用扶持清政府来保持和扩大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则更加猖狂，借口黄种人如能振兴，就要成为“黄祸”，威胁世界，鼓吹灭亡中国。此时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应该如何面对，便成为当时中国仁人志士关注的重要问题。二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已经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它作为中间阶层，具有人多势众的特性，仍然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国农民阶级由历史前台退居历史后台。在由北方农民掀起的义和团运动中，落后的农民与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抗衡，精神可嘉，但结果不仅不能救国，也更加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不能主导时代。此时唯有正在发展壮大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领导人民进行救国救民斗争的能力，时代也赋予了他们拯救祖国的历史使命。

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是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他们几乎同时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他们对中国国情、清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认识不同，康、梁认为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蒙昧无知，改革中国的方法必须从启发民智入手，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教育阶段，使人民的觉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时才能改变中国的封建政体，因而主张维新改良，反对革命，主张渐变而不主张急变、激变；而孙中山则认为，中国的衰弱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领导造成的，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宰割的耻辱地位，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两种救国方法同时在中国出现并均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现象。康、梁的维新运动失败，戊戌六君子遇害。孙中山于 1894 年 11 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该会的章程有 9 条，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在秘密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纲领。^① 兴中会总会设于香港，会员陈少白在香港发刊《中国日报》，作为该会的舆论阵地。另外，兴中会还在横滨、长崎、河内、旧金山、中国台湾等地设立分会，在华侨中发展组织。维新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实践继续前行，1903 年

①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 年 11 月 24 日）、《檀香山兴中会盟书》（1894 年 11 月 24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第 19～20 页。

后，革命大潮蔚为壮观。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此时已经具备了联合海外各种革命势力，并对国内反清斗争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的领袖地位逐步确立，在民众中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过去人们都骂孙中山是“江湖大盗”、“乱臣贼子”，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武装起义的开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孙中山是救中国的英雄，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就为孙中山施展自己的才能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孙中山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最重要的在于他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及时提出解救中国危机的主张。孙中山制定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问题所在：当时清政府“因循苟且”，广大人民“蒙昧无知”，而“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乃在于清政府误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将中外华人联络起来，组织团体，共立誓言，开展振兴中华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后，要“创立合众政府”，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政制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①这个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解救中国的主张。并以一种超前的意识，把中国的舆论界引向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他还引进西方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意识结合起来，打起民族主义旗号，把清政府孤立起来，并宣布它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洋人朝廷”，这在当时也是审时度势所采取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到了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又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分别批判西洋人分割中国的谬论，进而指出清政府的施政之策是“务以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事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禄诱奸邪”，指出欲依靠满人自全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因此，“凡国之所以能存者，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中国人只有“因其势顺”，“再造一新支那而已”。^②1903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军事训练班上为学员制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③这就为后来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宗旨。

①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檀香山兴中会盟书》（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页。

② 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221页。

③ 孙中山：《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1903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

由此可见,时势造就了孙中山,但孙中山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为组织革命政党和筹备革命经费竭尽全力。作为一个领袖,不仅要有胆识,还要有高超的智慧和组织领导才能,能为革命指明方向,为国家指出前途,并有魄力和魅力领导和发动人民起来同自己一起奋斗。在这一方面,孙中山也是能人所不能,他不仅在 1905 年组织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还创刊《民报》,提出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于 1906 年秋冬间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等 8 个文件,规定了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程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以及军政府与各方面的关系,还在对外宣言中,宣布益敦睦谊的对外政策,这就为革命建国确立了基本原则。他打出革命的大旗,号召革命,开启了革命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忘我地工作,为革命事业献身,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开创了辛亥革命的伟大事业。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必须体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作为中国的先进分子,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必须代表中国各民族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孙中山 1906 年秋冬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及后来的《建国方略》(“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三民主义》等书,就可以明白,他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建国方略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一点看,他的思想、智慧和能力都高出同时代的其他人。

辛亥革命并非一人一力推动的,它是一批革命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孙中山是革命领导集团的杰出代表和佼佼者。除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外,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在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还有光复会、华兴会。光复会由陶成章和蔡元培以龚宝铨组织的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于 1904 年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①光复会的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主要骨干还有章炳麟、秋瑾、张恭、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华兴会于 1904 年 2 月 15 日在长沙成立,主要骨干有黄兴、周震麟、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华兴会没有留下成文的政治纲领,在组织长沙起义时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领导成员的言论着重宣传满汉有别,主张推翻满族建立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革命进行的

^① 章炳麟:《〈革命军〉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第 193 页。

方式上主张“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①即发动武装起义，群起攻击清政府。从当时的领导者看，光复会的蔡元培、秋瑾、章炳麟，华兴会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及兴中会的孙中山等都属辛亥革命的领导集团成员。其中有些人在革命中英勇献身；有些人则因思想和宗派的局限而不孚众望，难以领袖群伦；有的长于宣传，有的革命经历有限。他们都对辛亥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兴作为华兴会会长，坚持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并准备趁慈禧70生辰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后逃往日本。1905年黄兴与孙中山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属协理地位。他在南方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指挥武汉保卫战，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但黄兴在理论深度、智慧和谋略方面都无法与孙中山相比。宋教仁是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1904年华兴会成立，他为副会长，参与武装起义。1906年他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主持本部日常工作，1907年赴辽东运动绿林“马贼”反清，创设同盟会辽东支部于安东。他鼓吹武装起义，开展“长江革命”，1911年7月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长江流域的反清起义。宋教仁从西方寻找思想武器，按照西方的模式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谋略和智慧方面有所欠缺，缺乏主持大局的本领，也缺乏众望所归的崇高威望。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当时中国的革命民主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孙中山的经历，也没有一个人有孙中山的威望和系统的革命思想，更没有一个人比孙中山更了解中国和世界，所以辛亥革命的领袖非孙中山莫属。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作为领袖，他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为群众指明出路，比其他人更善于解决运动的物质条件和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更有能力带领群众、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从这些方面看，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是在斗争和实践中产生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人民选择了领袖，领袖也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这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确立的中国发展道路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饶怀民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62页。

“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① 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是近代中国时代变迁的标志。然而，辛亥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它开辟的中国发展道路，建设一个独立、共和、民主和富强中国的发展方向则不可逆转。尽管民初还有人想复辟帝制，做专制主义的皇帝，但因为皇权已经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共和、民主才具有生命力。可见，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建立的共和民主政治未能延续，资本主义制度未能在中国确立。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进行了 12 年之久的讨袁“护国”和两次“护法”斗争，但是共和民主制度还是恢复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原因有多种，但不能说是孙中山的局限，也不能简单地归罪于革命党的软弱。财政困难，外国不承认民国政府，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争夺自己的权益造成中国的不统一，再加上商人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革命党人内部又分化，由思想分歧造成组织分裂，抑制了主观的努力，造成革命政府无法与守旧势力抗衡。但从客观上去考察，民初的中国出现反复，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民初的中国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之位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步步破坏辛亥革命成果，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采取各种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逐步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并力图恢复帝制。第二种是以张謇、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但两派的民主性以及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联系有深浅的不同。立宪派虽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一翼的代表，但实际上其阶级基础相当复杂，不仅包括已经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地主，也包含官僚和商人以及开明士绅。由于立宪派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所以武昌起义后，长期同革命派对立，反对革命，力图恢复旧日之势力，成为拥袁势力。他们虽曾对袁氏复辟帝制不满，甚至拍案而起，但后来又拥护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第三种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是当时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领导革命推翻清朝，但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以《民立报》为代表的一派，以章士钊为代表主张对袁世凯要“监督与匡助并行”，在维护袁世凯统治

^① 江泽民：《纪念孙中山》，《江泽民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 593 页。

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政党竞争实行责任内阁。^① 这部分人代表当时革命党人主流的思想主张。以《民权报》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以戴季陶为代表，却认为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革命已经失败，痛斥袁世凯为“共和之敌，国民之贼”，^② 要准备发动第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继续奋斗，但已出现“急进”与“缓进”之分。中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无论传统意识还是传统的阻力，都不会随着一次革命就退出历史，在进步的势力还不至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去控制形势时，政局的反复难以避免。它是中国社会本身新与旧、前进与复辟、维护中国封建传统还是追随时代发展的大潮并走向新的道路斗争的结果。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未能彻底铲除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因此，民国成立后，很快出现了一股以尊孔为旗帜、以反对共和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它或与袁世凯的集权专制相配合，或为帝制复辟思潮鼓噪。复古思潮是袁世凯掀起的，他的目的是为了复辟已被推翻的君主制度。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奉为中华立国的“人道之大经”，要全国人民“恪循礼法”。^③ 袁氏抬出孔教和三纲伦常是为了维护君主和封建等级关系。在袁氏的号召下，各种尊孔团体纷纷涌现，北京有孔社、孔教会等组织，太原有宗圣会，扬州有尊孔崇道会，青岛有尊孔文社，上海有孔教会，一时间，尊孔狂潮四起。孔教会的发起人是康有为的门生陈焕章，他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尚贤堂讲述孔学，成书《孔教论》。1912年夏，他根据康有为的意图，在上海创建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④ 袁世凯及教育部准予立案。正是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孔教会迅速发展。1913年2月又出版《孔教会杂志》，由陈焕章主编。尊孔的人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从反对共和的目的出发提倡尊孔，有的则是力图借助传统文化精神挽救社会和人心。尊孔复古思想是包含政治与文化双重取向的保守主义思潮。从尊孔到祭孔，到立孔教为国教，到廖平从学术思想出发为尊孔读经构筑哲学的殿堂，都是从学术入手却又走出学术而进入政治。这是当时一部分中国学人的选择，但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则提倡从虚君共和到开明专制。武昌起义后，留居日本的康有为写下《救亡论》10篇，提出了“拨乱反正”的

① 血尔：《毋受愚》，《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

② 啸秋：《都督问题》，《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③ 《整顿伦常令》，《政府公报》1913年9月21日。

④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丛栏录”。

实施方案——虚君共和。这里的虚君共和实际上不过是对君主立宪的一种改头换面的称呼。康氏要保留君主是依据中国的历史传统，保留一个一以贯之的君主，使国家免于动乱。清朝皇帝已经倒台，康氏便抬出孔丘之衍圣公。他强调，衍圣公为圣者之后，其世家历两千四百余年，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因此，他筹划了以衍圣公为虚君的实施步骤：“今各省公尊孔氏衍圣公为帝，或谓文宣帝，或曰衍圣帝，迎主北京，或迁都山东、南京、苏州，移资政院从之，即改为国会，先召集各省谏议局议员与资政会议，并为国会议员，公议大政，公举百揆（即总理大臣）。公订外约，则秩序不紊，争乱可泯，中国犹可保存也。”^①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但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决定的，要取决于时势和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当时民主共和已成大势，康氏的虚君共和当然不可能实现。1912年2月，梁启超又写信给袁世凯，提出行“开明专制”主张。何谓“开明专制”？梁氏的说法有二：一是保持形式上的共和政体，二是大总统要“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即大总统要操纵共和政体这架政治机器。因为大总统的专制是在共和政体的形式下完成的，所以冠上“开明”二字，称“开明专制”。梁氏认为，当时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旧官僚派、旧立宪派、旧革命派。认为旧官僚派中的“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可以入立法部以用其长；革命派“纯属感情用事”，“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对其“不可威压之”，“不要阿顺之”，“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② 而这“健全大党”即旧立宪党。很明显，开明专制要借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力量才能实现。这就是梁氏以防备革命动乱为前提，利用现政府即袁世凯的集权专制统治，把中国带上宪政的轨道——实现开明专制。严复等又于1914年、1915年提出君政复古思潮。1914年2月，严复在《庸言》报第25、26期合刊上发表《〈民约〉平议》一文，系统批判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严氏的用意当然不是从学术上研究卢梭的学说，而是力图以此论证共和革命在中国之不可行。严氏清算共和革命的理论，其结果必然使其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所以，一方面，他认为“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得出了中国应恢复君主制度的结论。^③

① 康有为：《救亡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652～678页。

② 梁启超：《致袁世凯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12～613页。

③ 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第733页。

此外，民国初年，在尊孔复古思潮喧嚣的同时，还有一股与它们若即若离的暗潮，这就是以前清复辟派为基础的宣统复辟思潮。它的基本队伍主要是善耆、溥伟、升允、铁良为代表的清廷王公贵族；以劳乃宣、胡思敬、刘廷琛、陈毅、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等为代表的兼具封建官僚和“文人学士”双重身份的前清遗老；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他们无论在身份地位还是在感情上都与清王朝存在着种种关系，并不甘心失去一切。民国成立后，他们很快集聚在退位宣统皇帝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

总之，民初的复古思潮一是在文化上打出孔教与尊孔的旗号，力图在社会转型之时用孔教来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以孔教道德来挽救民初颓败的社会，这以严复的尊孔读经论、康有为的孔教活动和廖平的“孔经哲学”为代表，成为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翼；二是政治上对共和政体提出修正，既从理论上论证共和政体不宜中国，又试图通过借助传统君主形象或重塑新的权威来达到新的社会整合的目的，这以溥仪、康有为的“虚君复古”为代表，成为一种保守的政治思潮；三是全盘否定民主共和，恢复帝制取代共和，这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溥仪丁巳复辟和围绕帝制活动而形成的帝制复辟思潮。它们构成民初复古思潮的三个层面。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反复，掀起了一股复古狂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大反复，主要是由民初的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与政治结构和广大民众的沉睡状态等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中国社会新的转型的诸多因素在孕育成长，另一方面是复辟倒退逆流的猖狂。在这场新与旧，共和民主与君主复辟思潮的较量中，一时新的斗不过旧的，出现反复。可见，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不起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民初政局的混乱也是各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并非孙中山左右得了。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复辟思想和复辟君主专制的行动，召致辛亥革命开辟的共和民主政制的失败，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局限造成的，而是民初中国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中国人民怀念孙中山是对他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精神的肯定。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中国的共和、民主、富强，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英雄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结束了中

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中国的历史推上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他为中国的历史建立的一个丰功伟绩。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捍卫共和,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废除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又同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了各种斗争。只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孙中山的逝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而且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都为失去这位伟人而悲恸不已,各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寄托对孙中山的怀念。孙中山逝世当日,段祺瑞政府即下令下半旗志哀。同日,“孙中山先生北京治丧处”宣告成立。全国各省通讯社及报纸纷纷发布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举国志哀,并引起了国际友好人士的深切悼念。驻京苏联大使加拉罕,以及德、英、比、丹、法、荷、西、瑞典、葡等国公使,均亲临吊唁,不少国家的政府或友好人士发来唁电,对孙中山病逝表示哀悼,祝愿孙中山开创之革命事业不朽。^①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于3月15日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文,并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赞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逝世的深切缅怀之情。

从人民悼念孙中山的盛况中,可以看到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和伟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敬仰,也反映了孙中山一生的事业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925年3月19日上午11时,孙中山灵柩由北京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大殿,民众护灵致哀者逾10万人。24日,治丧处正式发表公告,指出10日之内,北京党人及各团体前往悼祭孙中山致哀者,达数十万人。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纷纷举行哀悼大会,不下数十万次。各界人士纷纷以挽联这种特殊形式表达哀思,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楹联史上空前的。据孙中山国葬纪念委员会编辑的《哀思录》记载,自孙中山3月12日逝世到4月1日的20天内,北京“治丧处共收到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0余副,横额500余件”。从《哀思录》的“追悼记事”还可看到国内外部分地区追悼会送挽联的盛况:大多数消息都说“四壁布满挽联”、“各界挽联甚多”、“挽联鳞次”、“不可胜数”。其中以湖南省为最,4月18日至20日在长沙举行的湖南全省各界追悼大会,“挽联共70000余副,分挂会场内外墙壁无虚隙”;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江西省学生联合会追悼大会,“挽联共计7000余副”;广州黄埔军校追悼会,“挽联甚多,约有几千副”;山东济南各界追悼大会,“联多至2000多副”;陕西省西安追悼大会,“挽联之多,28间大会场层层挂满毫无隙地,共约千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第2134页。

副”；江苏省镇江追悼大会，“长甬道两旁挽联千余副”；江苏淮阴追悼大会的挽联也有“千余副”；湖南平江追悼大会“挽联亦在2000副以上”。^①台湾当时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但在孙中山逝世后第二天台湾《民报》在《哀悼中山先生》文中说：“中山先生虽死，中山主义决不死；中山先生虽亡，民众运动绝不失败。”这些挽联、电讯及追悼大会表达了国人和海外友好人士对孙中山革命主张、爱国情怀和丰功伟绩的颂扬，表达人们对逝者的崇敬之情和悼念之意。另外，为追悼孙中山，国内外发表的唁文、祭文、电函更是多不胜数，据《永留浩气在人间——1925年海内外悼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纪实》一书粗略统计，仅是国内的唁电就有84件；国外有苏联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拉罕等人致中国国民党、宋庆龄和孙科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驻美国圣路易分部、驻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以及英国利物浦、中国留日爱知大学同学会的唁电16件。苏联、日本、美国、英国、墨西哥、法国、新加坡、加拿大、菲律宾、越南、朝鲜等许多国家及有关人士都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追悼孙中山，怀念孙中山。^②诚如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说：“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我们永远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③

为永久纪念孙中山，1925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永丰”舰改名“中山”舰，将广东香山县改名中山县；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为了纪念广东大学的创办人孙中山，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虽然孙中山一生的历史功绩不止于辛亥革命，他晚年领导的国民革命和重新解析的三民主义，对后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政派影响深远，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但在人民的怀念中，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940年4月，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崇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中国共产党人则尊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中华民族的英雄。从1920年代中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常举行一些重要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1941年辛亥革命3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隆重纪念，

① 参见刘作忠选编《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前言”。

② 参见葛培林撰《永留浩气在人间——1925年海内外悼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纪实》，《中山文史》第39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中山文史编辑部，1996年印行。

③ 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与山西》，团结出版社，2011，第12页。